

基督教传道人、留学生、买办与革命者——宋耀如、陆皓东以及孙中山关系的初探¹

顾卫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晓生兄：宋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于世，而上海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之谈。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

——1912年4月17日孙中山致友人李晓生信²

一

宋耀如是近代中国早期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的名字就反映出他奇特而又曲折的人生经历。他本姓韩，是其父韩鸿翼的第三个儿子。他于1863年2月出生于当时广东省文昌县城西郊一贫寒的农家。³ 他的家族有客家人血统。12岁时，他过继给没有子女的舅父，改名宋耀如。后来在美国入教时所用的名字是查理·琼斯·宋（Charlie Jones Soon），查理·宋很可能是宋耀如一个英国化的表述（Anglicized version），但奇怪的是当中还加了一个琼斯（Jones）。没过几年，他在姓氏宋（Soon）的英文后面又加了一个尾缀“g”，变成“Soong”。据说宋耀如回国以后，当时在《万国公报》任中文主笔的沈毓桂替他改名为曜如，字嘉澍。

曜与耀相同，如同普照大地之光辉；嘉澍一词则出于《后汉书·明帝纪》中的“冀蒙嘉澍”之典故，意为及时雨的灌溉。⁴ 然而，在当时人们往来书信及后来的历史著作中他又被称为宋嘉树。

宋耀如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可谓波澜壮阔，与当时绝大部分固守家园、不闻外洋事物的中国人迥然而异。当然，这种生活也并非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其命运使然。1875年，12岁的宋耀如被舅父带离家乡，远渡重洋，去了北美的波士顿，与当时成百上千的文昌县飘洋出海的年青华工一样，成为身处异域的华人打工仔。他先在波士顿舅父的丝茶行里做事，并正式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氏。他想读书，却遭养父拒绝。性格倔强而独立的宋耀如离开了养父的丝茶号，浪迹天涯。期间，他得到一名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理·琼斯（Charlie Jones）的收留。这位军官是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北方军中的老战士，曾经与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 1809—1865）握过手、谈过话，是一个热忱的废奴主义者。宋在查理的影响之下毕其一生都成为忠实的林肯主义者，他剪下了脑后的辫子，并对自己说：“从那时起，我自己在心灵上皈依了基督教，崇拜林肯。”⁵ 但此时他尚未正式入教。查理推荐宋耀如去美国海军的一艘缉私艇上服役，他因表现出色得到船长艾立克·加布理尔的欣赏。在这位舰长的帮助之下，他脱下戎装，于1880年在北卡罗莱纳州（North Carolina）美国监理公会（Methodist



图 3-1 宋耀如

Episcopal Church, South）受洗入教。为了纪念在精神和物质上都给了极大帮助的查理·琼斯，宋用了他的名字作为教名。在后来的西方，他的本名反而不彰。⁶ 1881年，受监理公会的委托，德罕姆（Durham）著名的实业家和慈善家、监理公会信徒及该会所办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的董事卡尔（Julian Carr）成为宋耀如的监护人，⁷ 不久即安排他进入了三一学院。三一学院最早可以追溯到1838年，它开始叫布朗学校（Brown’s Schoolhouse），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兰道夫郡（Randolph County），即今天的三一城（town of Trinity）。1841年，由美以美会（Methodist）和贵格会（Quakers）的联会差会机构（Union Institute Society）的领导人布朗特莱·约克（Brantley York）接管。1851年北卡罗莱纳州在法律上承认它是一所正规的学校（Normal Collage）。美以美会的布道家可以在学校中教书，同时学校也奉行“自由教育”（free education）的原则。1859年正式改名为三一学院，教训为“Eruditio et Religio”（即知识与虔敬）。⁸ 1887年这所学校迁到德罕姆，并接受了当时美国著名的烟草工业家和慈善家、美以美会信徒杜克（Washington Duke 1820–1905）的资助。到1924年，杜克的儿子詹姆斯·杜克（James B. Duke）以400万美金设立基金，校董会决定将校命名为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宋耀如于1881年入学，成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一名外国学生。尽管宋耀如在该学院没有拿到任何资格证书，教会还

是希望培养他成为日后去中国的传教士，他们让他学习英语和圣经，他完成了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于1882年进入万德毕尔特大学就读（Vanderbilt University），这座私立的研究型的大学建于1873年，位于田纳西州（Tennessee）的纳斯维利（Nashville），以当时从事铁路以及轮船的著名实业家万德毕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的名字命名，这位实业家和慈善家住在北方，没有到过南方。但他捐献给南方一百万美元建立大学，希望弥合南北战争留下的创伤。⁹ 1885年，宋耀如结束了在该校的学业，被监理公会按立为传道人，年底被派回上海传教。

美国的监理公会渊源于美国的卫斯理宗教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初创于1784年。1844年，因黑奴制度的争执，发生南北教会的分裂，¹⁰ 南方教会称为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中国，南方的称为监理公会，北方称为美以美会。¹¹ 在南北方教会分裂前十多年，该教会内部已经讨论到东方传教的地点和工作，当时许多传教士都认为中国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地方。1847年，美以美会派两名传教士搭帆船到中国福州。¹² 监理公会则于1848年4月28日派秦右（Rev. B. Jenkins, D. D）和戴医生（Rev. Chas. Taylor, M. D.D.D.）从波士顿搭船来华，8月中旬始抵香港。秦右夫人生病，暂留香港，戴医生则与夫人于9月抵上海。当时的上海开埠不久，商旅云集，监理公会也以上海地处华东沿海的交通要道，便以此地为宣教的中心。戴医生以及稍后抵上海的秦右，于1849年在临近王家码头的地方，购置土地，建造教堂和会所，当时的教堂取名福音堂，于1850年落成，以后又建两所小学以及一所女学校。1853年，监理公会总布道会又派耿惠廉（Rev. W. G. E. Cunnyngnam, D. D）在上海虹桥建立第二个教堂，名化善堂。1854年，先回美国，又返中国的秦右携唐雅各布（Rev. J. L. Belton）、雷大卫（Rev. D. C. Kelley, d. D.）以及蓝柏（Rev. J. W. Lambuth. D. D.）三位教士来华；1859年，总布道会又派

林乐知（Rev. Young J. Allen LL. D.D,D.）¹³ 和华美德（Rev. M. L. Wood）来华，他们于 1860 年 7 月抵上海，居郑家木桥监理公会住宅内。当时蓝柏得到太平天国政权所发给的旗帜，与中国传道人刘竹松到苏州开辟传教区，新来的林乐知也在上海四乡的南翔、青浦、嘉定旅行传道。1861 年，美国南北开战，总布道会的经济大受影响，有些传教士回国，林乐知则进上海制造局办事，兼任上海广方言馆的讲习，蓝柏则出任驻上海的美国副领事，兼做布道工作，秦右于 1860 年索性受任于美国驻沪领事，不过于次年去世，葬上海八仙桥西人公墓。直到 1870 年中期以后，教务才有恢复，1875 年，潘慎文（Rev. A. P. Park. D.D.）来华任传道及兴办学塾事宜，次年，慕文会监（Bishop Marvin）来沪视察教务，又过一年，蓝柏之子蓝华德医生（Rev. W. R. Lambuth, M. D. D.D.）来华行医传教。1878 年女教士雷金贞（Miss Lochine Rankin）和妹妹雷金义（Miss Dora Rankin）也到南翔开教并创办学校（中西书塾）。当时监理公会在郑家木桥建立一较大的“福音堂”；又创“美华书坊”，印刷教会书籍及布道单张，为沪上铅印鼻祖；又在苏州天赐庄（原名天师庄）开设“中西医院”，即后来著名的“博习医院”；1881 年，又在上海创办中西书院，由林乐知任监院。

宋耀如于 1885 年底监理公会派遣回中国传教。¹⁴ 据《中华监理公会第一届年议会记录》，在 1886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时 30 分，中华监理公会第一届年议会在上海林乐知住宅开会，自 24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闭会，由潘慎文担任临时书记。“林乐知、孙乐文、刘乐义，冯昌黎由北美乔治城议会推荐而来，李德（Rev. C. F. Reid）由肯塔基议会推荐而来；潘慎文由密苏利议会推荐而来，而北加罗利那年议会第一班宋曜如（即宋教准）亦于同时移入。”¹⁵ 可见此时宋耀如已经开始了他的传道工作，当时监理公会在上海以及苏州周围地区共有 29 个牧境，宋开始活动的是两个很重要的堂口，一是慕尔堂（即今天的慕恩堂），创始于 1887 年，

初创于上海云南路，后迁于西藏路；另一个则为景林堂，创始人为林乐知，始建于 1882 年，地点在上海昆山路。¹⁶ 当时的监理公会分为圣日学部、学塾部、布道部、建堂部和董事部，宋耀如被安排在建堂部，同时有冯昌黎、林乐知、潘慎文以及柏乐文诸教士。但后来不久即被派往上海周边的郊区昆山，七宝和青浦和太仓出任传道员。¹⁷

根据《监理公会的纲例》¹⁸，宋耀如作为一个传道人应该履行如下的职责：（1）主持婚礼；（2）当长老和监督不在时，施行洗礼；（3）当长老和监督不在时，循环各教堂主持礼拜之事，并将各堂口的情况向长老报告；（4）循纲例收进、审问以及革出教友；（5）每年至少一次领将纲例宣读给信徒听；（6）当长老不在的时候，须主持每季季度的季会，要报告本季进教、病亡、迁移、退教、革出事宜以循环布道情形；（7）要为教徒登记造册，记录其住址，以便探望，中西教徒要分开记录，并记录如何进教以及将来出路；（8）将有关主日学校的情形，如学生人数、名单、家课、图书收藏记录在册；（9）特别要求信徒关注自己子女的教育，要鼓励子女入教会办的学塾接受教育，最好要入本会的学塾学习；（10）接受信徒的捐款，特别要将这些捐款用于资助传道学堂之事；（11）要将捐款分发恤款之情形，交给理捐部。¹⁹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宋耀如与监理公会当局，尤其与林乐知的关系并不融洽愉快，这是导致后来他离开监理公会的原因。据于醒民、唐继无所著《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的记录，监理会当局林乐知牧师与宋耀如之间的冲突由几件事情引发：（一）1889 年秋，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要选举一名代表，参加在美国田纳西州总部召开的会议，林乐知在当时是重要的人选，但宋耀如得知消息以后，“他像着了魔似地行动起来”，逐个说服各个牧区的教士，并征集中国信徒的签名，推选苏州教区的曹子实牧师为代表，据称，为运动此事，“凡有中国教徒的地方几乎都留

下了他那辆单人马车的轮迹”。结果曹子实牧师果然被选派为前往总议会的代表，这自然使林乐知不悦。（二）1892 年 5 月，美国国会通过排华结案，除外交官及随行人员以外，中国人一律不得入境或重返美国，对运载华人入境的船主处以重罚；华人不能证明其入境合法手续者，罚作苦工一年，并驱逐出境。宋耀如与当时圣公会的中国牧师颜永京、吴虹玉以及牛尚周、温秉忠商议后，策动《万国公报》的中文撰稿人袁康，以颜永京和袁康两人的名义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抗议的文稿，为林乐知所不悦；（三）同年 5 月 30 日，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在上海慕尔堂开会，讨论上海三一堂自养的事宜，宋的意见与林乐知完全背道而驰，最后在林乐知的寓所举行的辩论会上，宋耀如剪掉了他的辫子，（宋在美国时已经剪去辫子，回国时又蓄发）说：“从此，我同中国的半奴隶制决裂，同你们——不公正的监理会决裂！”²⁰

2011 年 9 月 18 日下午，笔者访问上海景灵堂（即原景林堂），遇主任牧师余江先生，被告知据该堂老教友得自于宋家的口传，宋耀如与林乐知之间的不和有如下的原因：（一）当宋氏在上海初次面见林乐知时，林坐着讲话，而宋一直站着，宋心里认为这是西教士对他的不尊重；（二）林要宋立即去昆山等地当传道员，但宋却因去国日久，想先回广东文昌省亲，林认为宋没有将教会的利益置于首要的位置；（三）林以及其他一些西教士并不满意宋在上海周边地区的传道工作，因为宋不会讲上海方言，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宋的倔强和叛逆的个性也很难令西教士接受；（四）林乐知等给宋的薪金只是一般中国传道人的份额，令宋感到不满。²¹ 总而言之，虽然林乐知常自命“余美国人也，寓华日久，爱之深，不觉责之切”，但心里仍然自认既然是他将上帝介绍给中国人的，自然地，与中国人相比，他离上帝更近；但宋耀如却偏偏不认同他的看法。²² 不过，宋的夫人倪桂珍并不愿意离开监理公会，不仅如此，毕其

一生，她还是监理公会中国传教区最虔诚和最有影响的女信徒之一。自然，她从没有在言行中干涉其丈夫的信念和心志，宋耀如也尊重她的意志自由。²³ 故监理公会一直称“宋太太热心服务教会”。²⁴

二

思想激越、行为特立独行的宋耀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联系的契机，便是他与陆皓东的相识。被孙中山称为“为民主共和牺牲之第一人”的陆皓东，其家庭虽然是广东人，但其家族及本人与上海一直有缘。据黄健敏教授所写的《翠亨村》一书，陆家是在明朝嘉靖年间从离翠亨村约三公里处的隔田乡敦和里（今中山市南朗镇崖口管理区陆家村）迁来的。清道光年间，陆氏已是村中最富裕的家族，道光八年（1828），村中的北极殿第一次重修时，留有《重修翠亨村祖庙碑记》，捐款者以陆、杨、冯、孙四姓最多，其中陆仁车捐款最多，为五十二两，是村中另一大姓杨家 23 位捐款者的款子总和二十三两的两倍多。黄教授据口传史料指出：陆家的陆仁车、陆厚车兄弟都是广州洋行的买办。陆仁车名载德，号友山，“敕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他在发迹之后回乡广置田产，举目所属，本乡及邻乡的土地，都要强行买下。陆厚车，名元泽，号德润，族谱上载其“敕授登仕左郎”、“候选巡政厅”，他的儿子陆廷光即为陆皓东的父亲，在上海做货物转运生意。陆皓东为家中的独子。²⁵ 据陆氏亲族陆灿（他是孙中山与陆皓东捣毁翠亨村中北极庙神像的目击者之一，当时他是个小孩子）所著《我所认识的孙中山——童年朋友陆灿的回忆》一书所记：“陆公讳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在上海出世（1867 年 9 月 12 日）；父讳恩，字廷光，号晓帆，在上海业商，驳艇运货，善画工，稍有余资。……十八岁时再往上海，习洋文不数月，

在电报局翻译电文。”²⁶

陆皓东出生于1867年9月12日，因其出生日为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故其小名为中桂。又有记载他的父亲名怀听，在翠亨村长大，成年后赴上海谋生，开始时在上海的洋行里做师爷，从事货物转手贸易，后赚到钱以后自己也开始做生意，并寄钱回家乡建屋和买地。陆皓东的父亲娶有二妻一妾，生四女一子。陆皓东的生母王金月为陆怀听的元配夫人，为翠亨村附近王屋村人。据陆氏后人回忆，陆怀听生前在上海是与同乡郑观应合伙做生意的。陆灿所著《陆皓东事略》一文曰：“前沪宁铁路总办，旅沪邑人郑陶斋君钦仰其人，认为谊子。”²⁷陆皓东11岁时，也就是1878年，他的父亲在上海去世。他的命运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随母亲护送父亲的灵柩第一次回到故乡翠亨，安葬了父亲以后，他便在故乡住了下来。陆皓东随即进入村中设于冯氏宗祠的村塾读书，与孙中山成了同学。据说少年的陆皓东“通群经能文章，精图画、音乐与机器”，尤其喜爱绘画，课间尝画《水浒》和《三国志》人物，塾师责备他不专心读书，以为绘画是浪费时间，陆皓东反驳说：“图画也是读书的事，为甚么要禁止呢？”

从陆皓东少年极为有限的记载中，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实：（一）陆皓东的祖父辈很可能是买办，父亲早年在上海经商，且与郑观应有来往，他应该属于许多早期在上海的广东香山商人群体中的一位，他本人是否是买办不得而知，但因为服务于洋行，所以一定与洋行和买办有联系；（二）陆皓东经历了一个家道中衰的过程。可以想见，如果没有他父亲的死，他很可能和当时众多的买办子弟一样，留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里接受教育（上海当时有这样的学校），而不是回到他所不了解的故乡的村塾，与那些在乡下从来没有见过外部世界的孩子一同接受中国传统的乡塾教育。这群村民孩子中包括孙中山，孙中山长陆皓东一岁不到，前者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后者生于1867年

9月12日，前者于9岁即1875年开蒙，后者直到11岁即1878年开蒙；孙中山是在与陆皓东同学一年以后于1879年才从翠亨村取道澳门前往檀香山的。当时陆皓东所接受传统的教育比孙中山更少，而眼界却比同班的孩子更为宽阔。少年的陆皓东在上海已经养成了热爱自由的性情，传统的死记硬背式的教育方法非但不能使他满足，还可能引起他的反感，所以才有他和老师的争论。陆灿回忆说：

对我们其他小朋友来说，陆皓东有些特别。他出生在大城市上海，比起我们，可谓见多识广。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聪明的艺术家，还具有某些音乐家的气质。他的观点非常进步，和帝象一样，不满村民对满洲政府的畏惧与麻木。他敏捷、活跃，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无穷的好奇心，一旦被激发，就有狂热的忠诚。²⁸

陆皓东在18岁时再去上海，时在1885年。他在上海时期主要学习电报，有迹象表明，陆皓东在少年时代即对科学感兴趣，陆灿记曰：“他还喜爱奇器，晚间所携灯仔，内自制抽力机器，水瓶一热则在内活动，乡人称其为‘奇人’。”²⁹有关陆皓东在上海学习电报的具体情况几乎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说明，他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的自供中说：“……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³⁰据沈渭滨教授推测，陆皓东由沪返粤的时间当在1892年。³¹也就是说，他在上海共住了7年的时间。当时的上海可能是全国电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1851年英法之间设第一条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而当时的清帝国仍然处于传统的通讯时代；电报业初进上海在1860年代中期。1865年英商富利洋行自行架设由浦东小岬至黄浦江口金塘灯塔的电报线路，全长19至26公里；1868年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接通至法租界金利源码头的货

栈，全长4公里；1870年至1871年英国一印度的电报线延伸至香港，英国大东电报公司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订立联线合同，规定大北公司向南不过香港，大东公司向北不过上海，南北电报联线将在上海汇合，总理衙门也允许设立香港—上海海底电缆。1870年丹麦人史温生（Saenson，?—1921）任大北电报公司上海站的负责人，筹建香港—上海—长崎的水线，6月，大北公司从香港敷设水线至上海，同时敷设由海参崴—长崎—上海的全长2237海里的水线。1871年4月，香港至上海的水线正式开通，这年，大北公司在远东已经下辖上海、长崎、厦门以及香港的电报站，拥有六条海底电缆，连通上海、长崎、香港以及海参崴各城市，上海和长崎由此成为远东两大国际电报网的通讯中心。³²1881年，盛宣怀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家电报局，上海早报局由经元善为第一任电报局局长，租黄浦滩路（今中山东一路）8号招商局三层楼房为局址，它在早期主要偏重于官方电报业务，初创时只有上海至天津一线。³³上海电报学堂初创于1882年，晚于上海电报局一年，专门培养电报专业的人材，它就是陆皓东最初就读的学校，它的校址在胡香宅会香里（今福州路西藏中路东南转角处），后移到郑家木桥（今福建中路）。³⁴最初的学生仅20人，主要学习收发报技术，学制不定。学优者派至上海电报总局任职，缺额陆续考补，后因急需电报人材，学堂规模扩大，先后添设测量塾、按报塾、额外塾，1910年与上海电报高等学堂合并，移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陆皓东在1885年入学，当时学堂才创办三年，有关他的学业和毕业的情况，史无明文，只知毕业以后至上海电报局充领班生。³⁵

据于醒民、唐继无《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所载，宋耀如与陆皓东相识于1889年6月间，介绍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批以及第二批留美幼童返国服务，分别在电报局和海关供职的牛尚周和温秉忠。³⁶牛尚周和温秉忠也是

宋耀如的连襟，据罗苏文的《上海，一座近代都市小传》曰：

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是徐光启的后裔，徐光启的女儿嫁到倪家，倪家世代信奉天主教，直至倪桂珍的父亲倪蕴山才改信基督新教。倪桂珍也是基督徒，她不缠足，毕业于裨文女校，会弹钢琴。裨文女校是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裨治文夫人（Eliza Gillette）于1850年创办的，是近代上海第一所教会女校。倪桂珍三姐妹分别嫁给三位留美学生（宋耀如、牛尚周、温秉忠），后两位都是晚清留美幼童，在他们的家属、婚姻和社交网络中，教会、留学生是重要的纽带……³⁷

倪桂珍的两位姐妹分别是倪桂清（嫁牛尚周）和倪桂殊（嫁给温秉忠）。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教授最近出版的新著《香江有幸埋忠骨：长眠香港与辛亥革命有关的人物》一书记载了温秉忠之父温清溪（1843—1915）在跑马地的墓地，原来温清溪先生原籍广东台山大步头堡乡，早年务农，后到广州习工艺，又到香港经商，接触到基督教，随伦敦会牧师理雅各（Rev.JamesLegge, 1815—1897）游学，1864年受洗，1872年按立为伦敦会执事，是筹建道济会堂的重要人物。他和为孙中山和陆皓东施洗的喜嘉理牧师（Rev. Charles Hager）亦有渊源关系，1883年喜嘉理来香港时，即住在温清溪名下的寓所，捐资协助喜牧师成立“美华自理会”，让出物业筹建香港公理堂，这正是孙中山和陆皓东受洗的教堂。该书记温秉忠事曰：

温家与关元昌家族是世交，同为香港有名的基督教世家，温清溪子温秉忠为1873年清政府派到美国留学的留美幼童。留美期间，温秉忠已经常与友人讨论政事，主张以西学方式作为改革方法；

又与好友牛尚周结识来自广东的宋耀如（即宋蔼龄、庆龄及美龄三姐妹的父亲），志趣相同而成为挚友。回国以后，秉忠与关元昌五女月屏（1865–1899）缔结姻缘。关月屏离世后，秉忠再和倪氏女子结婚，其再婚妻子乃宋耀如妻之姐妹。³⁸

据勒法吉（Thomas la Fargue）所著《中国幼童留美史》一书载，牛尚周（New Shan Chow）生于1861年，为1872年第一批被选的留美幼童，江苏嘉定人，出国时11岁；1881年返国时20岁，曾任职于江南制造局。并在上海电报学堂以及电报局服务；温秉忠（Won Bing Chung），广东新宁人，也是被选派的第一批留美幼童，生于1860年，出国时12岁，回国时21岁，曾任职于北京海关。³⁹由于牛尚周供职于电报局，因此与陆皓东的相识是可能的，而且是很自然的。据称陆皓东于1889年6月前往太仓面见正在那里传道的宋耀如时带有牛、温二人的介绍信，上面只有一句话：“他就是你要想找的那种人。”⁴⁰另据沈渭滨教授的看法：现在并没有确切的资料说明陆皓东何时见到宋耀如，他认为很可能是1890年之后，因为自那年开始，宋耀如由“巡行传道”改为“本处传道”，在上海城市租界里定居下来，他当时住在虹口美租界朱家木桥（今虹口东余杭路）一带岳父倪蕴山的家里，期间，他执教于位于西藏路的监理公会著名的慕尔堂（Moore Memorial Church），这座教堂建于1887年，以后监理公会在八仙桥的“圣三一堂”也并入该堂。⁴¹陆皓东既是新教信徒，慕尔堂又在上海电报总局附近，他要做礼拜，很可能就在慕尔堂。那么，与执教于该堂主日学校的宋耀如相遇相识，并非没有可能。这虽是推测，但合乎情理。据沈渭滨教授认定：宋耀如与陆皓东的相识与交往，“比较肯定的是在1890年宋嘉树（宋耀如）在上海定居以后，到1892年陆皓东偕宋嘉树南下和孙中山接触以前”。⁴²

可以推测的另一个事实，就是在陆皓东和宋耀如的交往中，陆必定向宋提到了童年时的好友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可能是引发1892年宋耀如与陆皓东共同南下，并初次与孙中山相见的契机（地点很可能在香港）。⁴³有关陆皓东在上海的行踪现在并无史料可以供详细查询，虽然他那并不可靠的自供自称“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⁴⁴但事实似乎没有那么简单，也不能仅仅归之于他早年对于科学的兴趣。一个较为可能的解释是；他很可能想利用电报这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通讯的手段进行革命工作。有迹象表明，陆皓东很早即有革命的愿望和志向，早在少年时代，“任何形式的起义都是帝象（孙中山）和陆皓东现在最留心的事情，他们讨论了失败了的太平天国起义”。⁴⁵据罗家伦所编《国父年谱》，很早的时候开始，陆皓东即与孙中山一样，敬佩美国华盛顿的民主与共和理想，他尝与孙中山讨论“拿破仑，华盛顿史迹”，⁴⁶另一个解释也同样地与革命有关，那有可能他在上海为革命事业筹措经费。据后来1895年广州起义的情况来看，革命者与会堂筹措的枪枝弹药为数不少，⁴⁷这都需要金钱的准备。陆皓东在上海筹措经费的来源，既有可能来自于一些与他熟悉的广东买办（后详），也可能与宋耀如有关。宋耀如是一名具有经商头脑的基督教传道人，曾经因资助革命事业而债台高筑，但他很快以经商的方式摆脱了贫困。据上海监理公会老教友的口传历史：宋耀如开设的“华美书馆”，印行圣经以及传道单张，所用的是与外国人印刷业不同的价格低廉的中国土纸，降低了成本，发行量很大，由此赚了不少钱。⁴⁸他坚持传教和经商必须兼顾，连牛尚周、温秉忠也同意和支持他的想法，在1893年1月至2月，他从美国购买了面粉机，所产的质优价廉的面粉供应上海租界内的面包房和粮店，获利颇丰。⁴⁹在此意义上，宋耀如似乎可被称为“具有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近代中国最早的基督教牧者之一。众所周知，宋耀如对革命事业的资助不遗余力，他的一部分金钱有可

能经由陆皓东之手转给南方的革命党人。

陆皓东在上海期间，除与作为基督教传道人的宋耀如、留美归国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诸辈交往以外，还与买办阶层有过接触。据罗家伦等主编的《国父年谱》曰：1890年，

陆皓东为上海电报局任职，为旅沪同乡郑观应（一作官应，字陶斋，1842—1923）所器重。是年陆皓东请假回乡结婚，观应则往广州治病，……（孙中山）先生或因陆皓东介绍得识郑观应，由观应将其怀抱改革的意愿转呈郑藻如，孙中山向郑藻如面陈改革计划的可能性也很大。⁵⁰

文中提到陆皓东回乡结婚一事，是指陆皓东奉母亲王金月之命，娶同县莆山村归侨、清朝禀生黎吉兴之长女黎竹青为妻。⁵¹从《国父年谱》这段记录可以看到：（一）陆皓东、孙中山与郑观应为有同乡之谊，陆在上海电报局任职时，与郑观应有往来：上文所述，陆皓东的父亲陆晓帆，长期在沪经商，经营南北杂货以及出卖自己的书画，还兼营货仓，他的店铺名北泰行，又名九百行；很可能他的家族早已与广东在上海的商帮有联络和往来；⁵²（二）根据罗家伦和吴相湘的看法，孙中山很可能是由陆皓东介绍给郑观应，并由郑观应介绍面见或致信给另一位同乡的乡绅郑藻如，郑藻如为广东香山县濠头村人，字玉轩。他是咸丰元年举人，受知于李鸿章；1881年（光绪七年）以候补三品京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他曾代表清朝处理美国排华风潮，是当时少数了解世界事务的官员，1884年（光绪十年）授通政司副使，次年迁光禄寺卿，1886年因半身不遂，离任回广东原籍休养。⁵³（三）孙中山在这年致郑藻如的信中指出：（1）重农桑、禁鸦片；（2）光文教，揽人才（有“远观历代，横览九州岛，人才之兴衰，风俗之浮靡，实关教化”之句），他主张将其改革计先实验于香山，后推行于

全国。⁵⁴孙中山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上李鸿章书非常相似。（四）最重要的是孙中山因陆皓东的介绍认识郑观应，同为香山人的郑观应出身于中下层的家庭，他的父亲原来是一名村塾教师，他的哥哥郑济东先在宝顺洋行当买办，后又到旗昌洋行当买办。⁵⁵1859年，17岁的郑观应因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他放弃传统的教育去上海做生意，他向叔叔，当时上海著名的买办郑秀山学习英语，又向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939—1928）学习英语；1860—1867年先服务于英商宝顺洋行，在另一位同乡、著名的买办徐润及其叔叔徐荣村指导下管理货运和货栈；1873年至1881年又成为太古洋行下设的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⁵⁶从1886年至1893年间，郑观应开始酝酿并且撰写其名著《盛世危言》，期间从1885年至1892年正是陆皓东旅居上海期间，1890年则是陆皓东回乡结婚、郑观应回广州治病及因陆的介绍认识孙中山的年份。郝延平先生将《盛世危言》与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的内容相比，指出：“孙中山1894年在上海草拟的《上李鸿章书》的主要思想、甚至文句格式，都使人联想起‘硕学买办’郑观应的思想和文采，孙中山与他曾有交往。”又说：



图 3-2 郑观应像

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前言中断言，西方在三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优于中国，即‘人尽其才’、‘地尽其利’和‘物畅其流’；孙中山在上李鸿章

书中，指出了四种情况，前两个同郑观应一样，第三个是‘物尽其用’，第四个是‘货畅其流’。⁵⁷

陆皓东、孙中山与郑观应之间交往的行迹，可以看到当时在广东、香港、澳门与上海之间的革命者、留学生以及买办交往的背景。

1894年2月，孙中山先是在家乡隐居了一段时间，专门写作《上李鸿章书》，以后，他又到广州，看到帮助他维持药店业务的陈少白，给他看上书的内容，征询他的意见，不久，又偕同陆皓东赴上海。⁵⁸“这份上书同陈少白商量，与陆皓东一同投递。事件并非个人之行动，反映了与孙中山志趣相投的人的共同愿望。”⁵⁹6月，他偕陆皓东前往天津，上书李鸿章，呈陈改革的方案，提出“人尽其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纲。

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管道，有过不同的说法，一说他在上海郑观应家结识了王韬：

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即理

雅各布）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下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郑观应）家里，一见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⁶⁰

二说孙中山：

自粤赴沪以前，曾由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致函盛宣怀之堂弟盛宙怀，请转宣怀向李鸿章推荐。先生至沪见盛宙司时在天津筹办东

征转运事宜，魏恒，盛宙怀，郑观应三函宣怀均曾亲阅，并在信封手批时日及‘孙医士事’，且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先生往见。⁶¹

沈渭滨教授早在1980年即从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的文书档案中找到三封书信以资左证，分别为魏恒、盛宙怀以及郑观应为孙中山所写的三封信，⁶²并由戈止羲教授订正。⁶³新近由黄宇和教授所写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一书中，对孙中山邀请陆皓东一起陪他去上海的动机也作出了合理的分析，他说：

孙中山拿了魏恒的信，就起程前往上海，并与陆皓东结伴而行。为甚么去上海？因为当时盛宙怀在上海。为甚么邀陆皓东同行？因为陆皓东是上海电报局的领班生，熟悉上海的情况，而他任职的上海电报局之总办又正是盛宣怀，孙中山希望陆皓东能设法打通那条请盛宣怀介绍见李鸿章的途径。⁶⁴

盛宙怀鉴于魏恒的情面而接见了孙中山，在他致堂兄盛宣怀的信中提及“顷有沪堂教习唐心存兄之同窗孙逸仙兄”之句，上海图书馆葛正慧先生考证此人可能是唐元湛，亦为广东香山人，1862年生，长孙中山4岁，“所谓同窗者，可能是故乡私塾先后校友含糊之词。至于‘沪堂’，可能是电报学堂上海分班之简称，是盛宣怀所开办，故不必全称”。⁶⁵

孙中山与陆皓东于1894年2月间来上海，6月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在2月至6月间，他们很可能一直在上海活动，一方面与盛宙怀见面，另一方面，很可能（或者说是一定会）与宋耀如见面。沈渭滨教授据孙中山于1912年4月17日致友人李晓生的信中所谈到的“宋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二十年来始终不变”之句，认为“所

谓‘二十年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限定语，不是一个模糊的约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以证明其他时间的情况之下，不应作为约数来读”。因此，他推定孙、陆、宋三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892年。⁶⁶如果这种判断成立的话，那么1894年他们就是第二度会面。据于醒民、唐继无《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全传》称，他们是在“阳春三月”见面的，而且不止一次，相与见面还有牛尚周和温秉忠诸人。⁶⁷孙中山向他们告知了此行北上的目的，但宋耀如不以为然，宋认为中国的情况不能够靠改良和上书去解决，而应诉诸革命。他的观点显然比孙中山更为激进，他虽然没有阻拦孙中山北上，但明确地告诉孙中山“中国需要的是华盛顿、林肯”。⁶⁸由于该书是一部基于历史事实的传记文学，后人无法知道这些话的来历和确切性。

不过，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和分析，以及孙中山本人后来的表述，在当时宋耀如比孙中山更为激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就两人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背景来看，宋比孙年长5岁，从1876年去美国，1886年1月回到上海，十年之间，他“用生命，用血泪去学习西方事务，然后用奋斗，用笑容去传播这些新知，他向往美国的立国精神，追寻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当他把美国内战前的情势和中国当时的现关进行比较，却发现历史悠久的祖国完全处于不民主、不自由的半奴隶社会”。⁶⁹考察孙中山的行迹，他的一生先后6次去檀香山，4次去美国本土，但在1894年以前，他没有到过美国本土。在1894年以前，宋耀如的对美国政治观念理解的核心已经是1863年11月19日林肯总统在格的斯堡演说中所表述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孙中山在檀香山时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但有关“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尚没有成为他的核心的观念，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以后逐渐形成的三民主义部分地归之于受到宋耀如的影响。⁷⁰

（二）在上述致友人李晓生的信中，孙中山称宋耀如谈

革命“二十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一世’”，又说“彼从事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⁷¹宋耀如本人在读了意大利烧炭党人的传记以后曾对倪桂珍和陆皓东说：“我是上帝的牧羊人，但从今天起，我同时要做一个隐身的烧炭党人。”⁷²有关孙中山自幼在乡间听太平天国老兵讲洪杨轶事、矢志革命之说，曾经广为流传，笔者亦以后来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一事似与此说自相矛盾为惑。最近读黄宇和先生《三十岁前的孙中山》一书，作者对孙中山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13至26岁）在夏威夷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ni School）奥阿厚书院预备学校（Oahu College Preparatory School）以及香港拔萃书室和中央书院所受的教育作了全面的考察，作者深入研究了这些学校的制度、课程、宗教生活和学习生活，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学校均为英式而非美式的教育。这些学校中所传播的法治观念对他影响深远，以及他医科毕业以后在澳门和广州行医时进一步目睹满清官吏的那种无法无天，严刑拷打嫌疑犯所造成的人间悲剧，皆加强了他改变当时制度的决心。改变制度，既可以从外面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也可以从里面用改良的方法把它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的思想历程经过了改良、革命、改良、革命多次转折，最后还是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⁷³与宋耀如相比，孙中山所受的教育（英式而非美式）和思想发展历程更为复杂和多变。⁷⁴

（三）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一文中指出：

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激愤。上海同志宋耀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遂开乾亨行于香港为干部、设农学会于羊城为机关。当时赞襄干部事务者有邓荫南、杨衢云、黄咏商、陈少白等；而助运筹于羊城机关者则陆皓

东、郑士良、并欧美将校数人也。予则常往来于广州、香港之间，惨淡经营，已过半载，筹办甚周，声势颇众，本可一击而生绝大之影响，乃以运械不慎，致海关收获手枪六百余杆，事机乃泄，而吾党健将陆皓东殉焉。此为有史以来中国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也。⁷⁵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是宋耀如最初在清朝甲午战败以后致信孙中山要他紧急回国发动革命，且孙中山将宋耀如与邓荫南、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等并称为“同志”，可以想见宋无论在思想、组织和资金上都深深介入到革命事业当中。

三

吾师陈旭麓教授在其名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中指出，近代中国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社会发生急剧的转变，产生了两种新的社会群类，那就是“买办阶层和教民”，它们是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之外的异类：

鸦片战争以后，外人来华渐多，其中大半是商人、教师，他们的活动，不仅带来商品、教义，而且犹如实行嫁接，在中国社会体内，因此长出了从未有过，但又非常畸形的新物。这就是买办阶级和皈依上帝的教民。在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外，好像出现了第五种职业阶层。这部分人在近代中国曾发生过非常特殊的作用。作为一个阶级和阶层，他们是依附于外国势力的人，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但是，一种结果又会引出另一种结果，中国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最早代表和

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出自买办当中，而教民中则有孙中山这样的人物。

又说：辛亥革命是“中等社会”的革命。⁷⁶从宋耀如、陆皓东、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温秉忠、牛尚周、郑观应、盛宙怀的历史关系当中，正可以窥见基督徒、牧师、留学生和买办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意义。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的一些历史轨迹：

其一，推动早期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事业的人士大都是南方的沿海通商口岸的人士，正是这些地方与外洋发生了最早的接触和联系，由此产生的社会嬗变也从这些地方开始。以宋耀如的家乡广东文昌县来说，据《冯宫保军牍集要》所载，光绪十二年（1886），冯子材于琼州黎平时奏文提及“文昌县人稠田少，每年出洋趁工服贾者甚多”，⁷⁷《文昌县志》如载：从1876年至1898年的23年间，仅通过客运出洋的琼州人就达24.47万人之众，平均每年一万余人有余，他们都是青壮年的劳力，多从青澜、铺前乘三桅船于冬至前后启程，趁北风漂流到东南亚或再转程到欧美各地。⁷⁸至于陆皓东、孙中山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更是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摇篮，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之父容闳以及后来出洋的许多留美幼童均来自广东香山或周边地区，众多的买办如郑观应、徐润、唐廷枢的故里也在这个地方，他们都在后来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所著《孙逸仙传记》曰：

广东人活泼的天性使中山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和敏捷的体魄，这种特长在他在环游海外做推翻满清事业的时期中安置他在优越的地位。

……

广东人天性聪慧、善于交际，他们热带上的人，体格总不能像北方人一样强壮，但是他们活泼灵便的体格无论干甚么劳苦的工作，都能弥补这种缺点。

……

广东人是勇敢、自持、耐苦的种族，他们虽然离本国的中心和北方很远，但很忠爱国家。……翠亨也能分润些广东全省所有的好处。中山在他努力建设中华民国的三十年工作中，广东人给了他不少帮助，因为他们是他们的同乡，所以在海外的广东侨民，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替他尽过力的。⁷⁹

另外，由于广东地处边陲，常常是清朝中央政府的辖治不逮之地，所以居住在广东边缘尤其是近海地方的一般民众，养成了一种自由的习性。孙中山曾对林百克说：

直到我十三岁离开中国到火奴鲁鲁的时候，我记得没有听见北京是皇帝权力的中心，不过知道翠亨村是与香山有关的。香山是我们翠亨的县城，在他的周围，那许多村的人们温和无变地生活。在政治和社会的行动很是整齐，好像永久依着轨道一样。因为翠亨和周围别的村子，都以为凡与法律秩序有关的事情，香山是权力最后的地方。所以他们认为北京是同我们没有甚么关系的。⁸⁰

这种在自由和无拘束的环境中生长养成的不羁性格，正是以后推动改革和革命的起点。正是因为南方以及沿海在中国近代的改革和革命事业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费正清（J. K. Fairbank）所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在其导论中一开始就讲“中国历史上沿海与内陆”的关系：

通商口岸的发展为中国带来新的交通和工业技术、新的有关外族的知识，同时也促进了一种民

族主义精神。郭实腊和裨治文的开拓性的地理学研究引出了魏源和徐继畲19世纪40年代的地理学作品。数十年以后，更出现了江南制造总局和基督教与一般知识传播社（SDK）的翻译工作。类似王韬这样的基督教改革家和报人在外来影响之下出现于香港和其他通商口岸，



图3-3 徐润

他们开始鼓吹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孙逸仙出生于最早的对外港口澳门附近，并且在檀香山和香港完成了学业。虽然他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主要宣传家，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海外渡过的。这可以表明，中国的西化论者一般都是沿海人。⁸¹

其二，在当时的通商口岸香港、澳门和上海之间，出生于广东（尤其是香山）的基督徒，留学生买办和西方传教士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这可以从陆皓东、宋耀如和孙中山之间社会关系网络中找出一点端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成为他们频繁活动的重要地点。陆皓东出生于上海，1878年父丧以后扶其父灵柩回到家，1885年至1892年间又在上海住了7年（其间曾回乡结婚）；在陆皓东短段的28年生命中，他在上海居住的时间约在17年之久。宋耀如于1886年作为监理公会传道人被派回上海以后，除短期离开上海去日本等地外，基本的活动也在上海；⁸²对陆皓东甚为器重并与之交往、再由陆氏介绍给孙中山相识的出生于广东香山的郑观应，从1859年开始，一直在上海从事经商和著述；⁸³另有两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的买办唐廷枢

和徐润，也在上海有过极为不凡的表现。唐廷枢（1832—1892）为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早年就读于香港马礼逊学校，19岁以后即在港英政府中翻译。1858年抵沪，先后任海关大写、正大写及总翻译，1863年任怡和洋行买办，1873年脱离怡和洋行参加上海轮船招商的改组，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官督商办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的总办。⁸⁴他在文化事业上亦有建树，曾着有《英译集全》传世。⁸⁵

出生于香山县北山村的徐润（1938—1911）于1852年14岁时即到上海宝顺洋行当学徒，1852年升为买办间富账房，1861年升为副买办，兼营宝源各货号的丝茶、烟叶以及鸦片，1868年脱离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任事于上海轮船招商局，当时唐廷枢为总办，徐润则为会办，他与唐廷枢是终生的好朋友，并且在商业上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刘广京先生《唐廷枢之买办时代》曰：“唐于同治年间并任上海丝业公所，养药局，茶叶公所及各善会董事，并曾与徐润叔侄等，合创广肇公所，为旅沪粤商最重要的组织之一。”⁸⁶可见唐、徐两人是旅沪广东商人中的领袖群伦的人物。

1892年唐廷枢在天津去世时，徐曾亲往天津吊唁。⁸⁷徐润编着有《徐愚斋自叙年谱》一书，由香山徐民校印，1927年出版，被收录于由台湾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50辑，该书留下了当时的买办与买办、买办与教会以及买办与留学生及留学生运动的史料，同时也反映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经济和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其地位迅速超过广州的盛况。兹从下列几个方面来看：

（一）咸丰二年（1852），刚到上海的徐润，他看到了小东门码头一带南来北往的船只，熙来攘往的繁荣景象，惊异不置。他这样写道：

亦昌号在咸瓜街，当时为南北大道，咽喉之区，

西则襟带县城小东门、大东门之所出处，东过两街则为黄浦，故市场最为热闹，南则帆墙辐凑，常泊数船数千号，行栈林立，人烟稠密，由水陆到者从黄浦陆行必从此街也。再北者有潮州会堂、天后庙、界外则是浦江。……⁸⁸

他复又记载了上海英美租界以及法租界扩界拓展的盛况，当时英美公共租界已经从外滩往西延伸至今西藏路人民广场（即当时的跑马场一带），往北则至宝山县界，换句话说，已经基本形成至1945年归还国民政府时的宏大规模。徐润这样写道：

跑马场计地四百八十亩，盖已三迁矣，每亩价值数十两或百余两，今价值数千两至数百两不等。又复占浦北地自跨有苏州河，立为美租界；……美界已占至宝山县界，又复于泥城桥之西，老闸桥之北，占为公共租界，一切布置，均不亚于英租界，总而言之，英租界也，美租界也，皆英人独掌其权，实三而一也。惟法人则各守疆界，横览十里洋场，以寥寥荒冢之地，竟成繁华富庶之乡，其经济之穷，力量之大，岂不伟欤！⁸⁹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租界是全国市政的模范”，⁹⁰徐润的记叙是1852年，陆皓东则出生于1867年的上海，期间相隔15年之久，当时陆皓东看见的上海租界的场景，比徐润的记叙更为繁华，应该不会不对少年的陆皓东以及后来到上海的孙中山产生影响。

（二）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还透露了买办与留学与留学生运动的关系。容闳（1828—1912）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854）的中国人，回国以后报国无门，于1859年曾经做过在上海的宝顺洋行在江西

采购茶叶的代理人。⁹¹因他与徐润是同乡，所以徐润曾经与他合伙在上海做生意。《徐愚斋自叙年谱》记曰：“荣村公来申拟做生意卖茶叶，番寄四千余件后开通源杂粮土号，资本二万五千两。荣村公五千，潘爵臣、容纯甫、李量之并余名下各五千……”⁹²文中所指的荣村为徐润的叔叔，容纯甫即为容闳。徐润后来还直接地介入了由容闳发起，得到当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支持的近代中国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洋的活动。在《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直接记录了在1873年曾国藩正是委托徐润帮助实现这一计划。在该书“同治十年辛未四十三岁”条下记曰：“冬十月奉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曾札委办理挑选幼童出洋肄业，……秋容纯甫带领去美，每班三十人共一百二十人，分四年出洋，经费由海关拨给。”⁹³可见当时徐润负责的是挑选幼童的工作。在他所写的第一批名单中，即有后来与宋耀如、陆皓东和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牛尚周”，名单上他的籍贯是“江苏嘉定，年十一岁壬戌”；还有“温秉忠”，籍贯是广东新宁县，“年十二岁壬戌”，又写有“父清溪，天津习机器”之语。⁹⁴在第一批留美幼童当中，出身于广东香山县以及周围地区的人亦复不少，是否可能与徐润的选择有关呢？

（三）《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记载了广东的买办与上海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书中不仅有记“中虹桥傍有三家传耶教房屋，桥边有一礼拜堂”之类有关教会和教堂的记录，还在“同治七年”条下，记录中谱主本人与另一位香山买办唐廷枢出任多家教会医院及机构董事的情况：“上海医院以山东路仁济医院开设最早，设有中外董事，唐景翁与余亦董事之一，此外辅元堂、清节堂、仁济、元济堂、格致书院，唐与余亦为董事。”⁹⁵仁济医院由最初到上海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魏林（William Lockhart，1811—1896）等建于靠近外滩的山东路，时间在1844年。⁹⁶王韬的墨海书馆也在附近，⁹⁷与开埠初年英国工部局（九江路）以及

圣三一堂的位置也十分接近。至于著名的格致书院，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建于1874年，地址亦位于山东路至西藏路的跑马场和慕尔堂之间，⁹⁸所有这些地方都在方圆一公里之内，可步行抵达。当时在这片英租界的区域之内，布满了外国的洋行、海关、领事馆、教堂、教会医院和学校。穿梭于其间的中国人多有教徒、教士、留学生与买办。据郝延平先生的研究，与徐润同任这些机构董事的唐廷枢从1842至1873年的31年（即10岁至41岁）间，其家族和他本人与教会学校、殖民政府、外人掌管的海关和洋行有着密切和长期的交往。⁹⁹而他自称本人早期在香港所受的教会教育为“彻底的英华教育”。¹⁰⁰而郑观应本人则是传教士所办的《万国公报》的忠实读者，“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巨大吸引，以致他有一回竟买下了一百份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泰西新史揽要》的汉译本，分送给他的北京的朋友们。）”。¹⁰¹众所周知，虽然1894年6月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但他还是将全文八千余字的上书以《上李傅相书》为题发表于上海的传教士所办，亦为郑观应热衷阅读的《万国公报》第69至70期（1894年）两册上连载。

另据徐润年谱以外的史料，唐廷枢和徐润还与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的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黄素士据监理公会年会纪录所撰的《监理公会重要西宣教传略，长老林乐知传》曰：

是年（1881）冬，（林）在上海八仙桥东首购地建造中西学堂第一分院，即前之三一堂是也。先生与刘乐义君同任英文教习。次年又在虹口昆山路建造第二分院，旋以第一分院并归斯校，改称中西书院。至一八八六年十一月正式派先生为中西书院监院，于是专任教育以及译书撰报工作。待布道会海淑德女士来华以后，经先生之协助，又在西藏路

汉口路转角建筑中西女塾。¹⁰²

另据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载：成立于 1881 年的中西学院共有三处地址：第一分院位于八仙桥畔林乐知住宅对面（即上文提及之三一堂）；第二分院则位于上海吴淞路，占地一亩五分；还有一个大书院，位于吴淞路，昆山路交界处，占地 35 亩，原为徐润的产业，两个分院先建，大书院后建。按 1883 年捐款清单中，绅商中买办及买办出身的人最多，有唐廷枢、郑观应、席正甫、朱宝珊诸人。¹⁰³

从这项纪录来看，唐廷枢、徐润与郑观应应该都与林乐知有交往，至少应是互相与闻的。至于徐润的产业如何成为林乐知的中西学院学址，值得再考。据称书院在 1905 年迁入苏州东吴大学以后，其原址成为东吴大学的法学院。至于黄素士文章所提及的在西藏路、汉口路转角所办的中西女塾，即为后来迁往爱文义路的中西女中，即为宋氏三姐妹的母校，监理公会早期来华的年轻女传教士海淑德即为第一任校长。

（四）《徐愚斋自叙年谱》中还零零星星记录了一些有关 1860 年代中期至末期上海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洋行买办势力增长的趋向。如该书所记：“同治五六年（即 1867 年至 1868 年以后），宝顺洋行获得利颇难，因南北花旗开仗以后各埠生意颇清，东洋、北洋、上海、福州各埠又复洋行林立，生意四通八达，无可收拾。……”文中有“上海”等各埠“洋行林立”之句，按上海由于其国际贸易地位的重要，仅开埠以后第一年，即有英美行洋 11 家。¹⁰⁴到 1852 年据当时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汇编，已有洋行 41 家，大部分为英国、美国和来自印度拜火教徒（他们是大英帝国统治下印度人中最西化的本地商人）所开设。¹⁰⁵开始时大的洋行都雇佣广东人做买办，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和宝顺洋行（Dent, Beale & Co），他们主要从事茶叶的贸易，但在 1860 年代中叶以后他们的地位受到浙江（尤

其是宁波）的买办的挑战。这种趋势发展到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虽然在香港广东人仍然是买办的主体，但在上海，浙江的买办已经超过了广东的买办。¹⁰⁶据郝延平先生的研究，在 1870 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 550 家外国洋行，上海有 203 家，香港为 202 家。¹⁰⁷可见，与外国洋行的经济联系方面，当时的上海并不亚于香港。

诚如费正清所指出的：由外国人带来的航海和发展经济的次要传统，“帮助了通商口岸混合社会的形成，养育了维新变法运动和早期中国社会，鼓励了个人主义精神和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同时，它也唤起了爱国主义和文化自尊感”。¹⁰⁸这个“混合的社会”，就是由最初与外洋事物发生接触的近代中国人——买办、基督徒、留学生和早期的维新家和革命者构成的。当然，他们往往由一个人身兼数重身分，如宋耀如则既是基督教的牧者，又是隐秘的革命家；孙中山既是留学生，又是革命者；郑观应则为买办和改革者，陆皓东自幼生长在通商口岸上海和南方，他的行迹一直在上海、香港、广州之间往来穿梭，所接触的对象并不外于上述的几种群类。其中买办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是商人，但却涉足于近代中国的改革甚至革命，这不能不说这与他们自童年时代即所受的教育迥然不同于由传统士绅出身的缘故。郝延平先生指出：与传统的儒家绅士相比，“买办似乎不大在意儒家教义，因为他们力量的上升恰恰是基于对正统儒教的背离，而同夷务，更重要的是同财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知道，精通儒学对于他们没有更大的用处，他们感兴趣的正是商业和工业的发展”。¹⁰⁹郝延平则统计参加辛亥革命的买办有何宽、杨衢云、谢缵泰、刘祥、杨心如等，兴中会的第一批买办成员有何宽、郑晓初、黄焯文、黎炳垣、刘祥、陆灿、温芬、温遇贵等等。¹¹⁰

在这个“混合社会”中的第二种群类即为基督徒和留学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两种身分往往兼而有之。¹¹¹按孙中山与陆皓东均为基督徒。《国父年谱》载：

1883 年冬天，陆皓东与孙中山一同受洗于基督教纲纪慎会（公理会）。

先生肄业于香港拔萃书院以后，课余常随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长老区凤墀习国学，又结识美国纲纪慎美部会（American Congregation Mission）美籍牧师喜嘉理（Rev. Charles B. Hager, 1850—1917），在他的劝化之下，孙中山与陆皓东同受洗于礼拜堂，由喜嘉理牧师亲为之施洗，孙中山署名“孙日新”；陆皓东则署名“陆中桂”。¹¹²

不过，最近根据黄宇和先生的研究，孙中山受洗的日子是 1884 年 5 月 4 日星期天，他是在同年 4 月 15 日在香港中央书院注册入学以后做出受洗入教的决定的。喜嘉理牧师有封亲笔信都说他只是为一个人施洗，所以黄宇和先生认为孙中山没有与陆皓东同时领洗，但香港公理堂受洗人名单又明明载有“陆中桂”的名字，并指明他来自香山翠亨。黄先生认为“陆中桂”的名字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添加上去的。¹¹³但黄先生指出：喜嘉理牧师在 1884 年 10 月 19 日聆听了一个人表达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又说此人是他自己的教堂中的一位教友介绍而来的，而这位教友是在香港读书的学生。黄宇和先生认为介绍人就是孙中山，而被介绍人很可能有是陆皓东。至于陆皓东添列于受洗者名单则很可能是孙中山在革命胜利以后追念陆氏而请喜嘉理牧师追加了的。¹¹⁴黄先生指出：“重建了陆皓东‘领洗’的具体情况，不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孙中山与陆皓东的交情，也有助于了解孙中山在 1884 年那个时代对宗教的热情。因为正是由于他对陆皓东宣扬了基督教的教义，陆皓东才趋向喜嘉理牧师表达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¹¹⁵事实上，陆皓东是否受洗无损于他对于基督教热忱。有迹

象表明，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陆皓东就已经对基督教十分投入，据当时又还年少的陆天祥回忆：“孙中山读大学时，这里也有几个传教士，是从澳门来的，沿途传教、派福音书，到翠亨祠堂门口等着宣传。有一次陆皓东招呼他在家过夜。”¹¹⁶有迹象表明，陆皓东可能将基督教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考虑。陆灿所写的《我所认识的孙逸仙》提及：

任何形式的起义都是帝象（孙中山）和陆皓东现在最留意的事情，他们讨论了失败了的天平天国起义，这场起义 1846 年由洪秀全发动，最初是基督教运动，但后来演变成成为有组织的反清斗争。他们注意到，起义是从破坏旧偶像开始的。¹¹⁷

由于陆皓东并没有去过国外，逗留在香港的时间也不长（这是喜嘉理牧师无法对他加以考察故未曾施洗的原因），他对基督教教义的兴趣一则是受孙中山的熏染，二则是从基督教与洪杨太平天国的联系而萌发的、并想深入探究的。虽然孙中山后来与教会的关系，渐行渐远，¹¹⁸但正如黄宇和先生所言：纵观他 1894 年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至 1925 年 3 月 12 日去世为止，他的行迹“酷似历史上伟大的传教士中人的事迹”，“孙中山立志奉献的精神从来没有改变，只是奉献的目标从救灵魂变为为救肉体（即救国救民）而已”。“孙中山处于国难深重的时刻，觉得救国救民比救灵魂更紧急。救灵魂，就让外国传教士去做吧。救中国，既不是外国传教士的责任，也不是外国传教士的愿望。救中国的责任，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去承担。从这意义上说，孙中山觉得救国救民是责无旁贷！”¹¹⁹从孙中山的行为可以推测他的好友陆皓东。纵观陆皓东年轻的一生，在奉献救世以及革命事业上的狂热，一如孙中山；据陆灿所言：“陆皓东狂热地为革命事业付出，甚至变卖年轻的妻子的首饰去资助革命活动。我有一个姑妈住在广州，她在来信中谈

到陆皓东的情况，让村里人心惶惶。”¹²⁰“他父亲死后留下来的财产颇丰，他毫不吝啬地提取出来作为运动的经费。”¹²¹陆皓东在乙未广州之役被捕以后的英勇表现，更使人想起耶稣为救世人而被钉十字架的殉道精神；孙中山在香港得知陆皓东被捕的消息以后，为营救他不懈努力。他联系了美国领事为他出面求情。还找到了陆皓东工作的电报公司，向清朝地方官吏保证陆皓东只是他们所雇佣的一个学生，不会真的参加造反活动。“但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个青年人的革命热忱。美国领事去了衙门，发现陆皓东已经写了供词。他向他的朋友解释说：他希望自己是革命事业的第一个献身者，他还说清政府可以杀他一个，但杀不尽数以百万计的后继的革命者。”¹²²

在广州起义前一年即 1894 年 11 月 24 日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入会时采用宣誓结盟的方式是：各人在开卷圣经上置其左手，右手向上高举，恳求上帝鉴察，然后宣读誓词，其“方式不采中国传统歃血为盟，而采用基督教手按《圣经》发誓，可见入会者大多数为基督徒或受西方文化影响甚深的人”。¹²³ 基督教会与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牵涉对于宗教和世俗、信仰与教会、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诸方面，也不是本文的主题。但后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等革命者最终对基督教的信仰抱着真正的虔敬，“他临终时表达了最后的愿望：用基督教礼仪送终。孔子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窃（黄宇和）以为孙中山的这个愿望是出自肺腑的”。¹²⁴

似乎经历了与耶稣一样的心路历程，近代中国早期的改革者和革命者中的很多人也都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是被遗弃和被拒绝的人。宋耀如曾经于 1915 年 8 月 3 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时他正因为宋庆龄欲与孙中山结婚一事极为不悦，即便如此，他仍然表达了对于孙中山的高度的理解和同情，在谈到“我们可能贫于物质，但我们既无贪心；更无野心，不大可能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任何

事情”。以后，他这样写道：

虽然有些人不会感谢您的志在创造伟大中国的努力，但是，我们属于那些感谢您的工作的人们中的一部分。您生活在一个超前的世纪，因此很少人能够理解您、感谢您如此热爱，几乎全心全意地进行的事业。中国不值得有您这样一个儿子，但是未来会给您公平的评价，授予您荣誉，就像他们授予从前的改造者孔子一样。孔子曾受到不道德的掌权者的驱逐。所以，您也被驱逐，离开您爱得如此之深的土地。¹²⁵

孙中山曾对林百克说：“虽然中国是愚昧，他还是爱它。”¹²⁶ 其实，在孙中山及其周围的群体如海外归国的留学生中，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在少数。著名的《中国留美幼童史》一书的作者美国人勒法吉在该书的后记中写道：当他在 1940 年上海的一家饭店与这批留美学生聚餐时，他看到当年的那些留美学生都已经是“身着棉丝袍的中国长者，他们惯用着美国俗语及 60 年前（即 1880 年年代）在新英格兰校园中赢得的绰号，互相招呼及寒暄”，“在和这些老绅士的谈话中，使我了解到，在美国金色的年代对他影响至大。现在，中国沿海大城市的留学生已经司空见惯。但他们于 1881 年（光绪七年）由美国返国时，实属空前之事。他们与中国的生活方式泾渭分明，他们的教育又使他们成为自己国土上的陌生人。与他们交谈，益感这种差异的存在。他们对中国竭尽忠诚，但仍被视为雇佣性的‘外国顾问’。使我忆起容闳当年决定使他们饱受欧风美雨之熏陶，以便回华介绍西方科技时，得以承受中国保守力量的冲击”。¹²⁷

最后，也是无疑地，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的这个“混合社会”中，除了少数的买办，绝大部分的人们都是真诚

的爱国者，他们深受西方与中国之间的差距以后才立志改变现状的。《国父年谱》记孙中山自檀香山归国以后的感受曰：

先生自檀香山返抵翠亨村，阔别数载，一旦归来与家人团聚，其乐可知。父母设筵相庆，颇望先生安守家园，以娱晚景，而先生殊快快也。故乡景物依然，……殊少变更。村民保守，安于天命，备受皂隶欺凌。乡塾教读，仍沿旧规，学童舍背诵强记外，殊少心智之启迪。先生耳闻目睹，感触颇深，乃决于市集要冲，行人麇集之区，宣传改革，期能以振聋发聩。¹²⁸

在这方面，宋耀如有着与孙中山相同的感受，当他刚从美国回到上海时，对另一位圣公会在上海的早期中国籍牧师颜永京说：

从美国归来，我也曾郁郁寡欢，闷闷不乐，也曾再想去美国，平心而论，我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在美国的人。但我是上帝的仆人，是负有伟大责任的迷途羔羊的牧人。我还是一个中国人，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我要传教，要布道，要开导他们，要拯救他们。¹²⁹

难能可贵的是，这批人既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并没有丧失自己独立的和批判的立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宋耀如是近代中国基督教本地化的最早的发起者，他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不应仅仅归之于他倔强的个性，更重要的是他想建立一个当地语系化的中国教会而与西方在华的教会置于平等的地位。当时在上海的与宋耀如同时代圣公会的颜永京及吴虹玉牧师都是同一类的教会本地化的先知先

觉者。

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都体现了对祖国的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从内心极为认同黄宇和先生的评断，他说：

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批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者，是沿海通商口岸〔岸〕接受西方教育的华人，其中不乏港澳的“番书仔”，“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这古训诚然不错，以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谢缙泰等为代表的，在沿海通商口岸被教育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只有一个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认贼作父，从来没有把外国人当主子。¹³⁰

本文最后以费正清教授的论述作为结语：

近代中国的海上联系，不仅成为西方入侵的管道，而且也将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引入了上海、天津、九江、汉口等新兴口岸城市，愈来愈多的学生涌向日本和西方，探求拯救自己祖国的道路。在那里，他们脱离了中国士大夫阶级通常与之紧紧相联的乡土背景。中国的新的现代派一般都失去了他们的农业之根。最后，这种联系都绝灭了。1895 年以来年轻的国民党革命者们都是典型的城市生活的产物，他们很少了解农村，在通过西方化拯救中国的努力过程中，他们掌握了西方学术和技术的许多内容。然而，他们也经常发现，自己脱离了中国的普通民众。但尽管如此，他们关于立宪政府，关于中国控制铁路建设，关于恢复因不平等条约而被削弱的主权要求，毕竟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天子专制政治的灭亡。所有这些民族主义的要求都表现出外来的影响。¹³¹